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九四期 ——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903c)

---

【研究报告】	非理性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潜意识（上）	宋永毅
【抗拒遗忘】	压制的记忆与待写的历史	白 夏
【往事追忆】	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批清运动”	戴维堤
【难忘岁月】	“秋后算账”：组织结论和处理	梁守福
【读者来信】	评王广宇的“桀骜不驯的蒯大富”	李自茂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研究报告】

非理性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潜意识（上）

• 宋永毅 •

现代心理学认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属性，它主要是指人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和逻辑程序而进行的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等自觉的意识和思维活动。在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极大的作用：客观规律的发现，政策和法律的制定，社会秩序的维持，社团生活的协调，都要依靠理性的力量。但是，人作为主体，其精神生活绝非是纯理性的，在它的彼岸，存在着情感、欲望、意志、直觉、理想和幻想、灵感、潜意识、习惯等等的不自觉地、自发的、偶然的、非逻辑的精神活动。这些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动。

〔1〕

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晚年毛泽东，一直是文革研究的持续不断、卷帙浩繁的热点所在。然而，海内外的大多数的研究还主要是集中在研究毛泽东的理性的层面，诸如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等。而对他一手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存在的大量非条理化、非规范化、非逻辑化、非程序化的精神现象，至今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其实，我们完全不必、也不应当把毛泽东的个人活

动和他领导的混乱的文革看作是完全有理性和规律支配的必然发展过程，相反，我们应当肯定种种非理性因素对他的决策、思想以及对文革进程的巨大影响。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和复杂性，比较客观地解释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扑朔迷离、跌宕起伏的历程。如果我们否认偶然性等非理性因素对文革的作用，那么历史进程就会变成一团永远无法解释和透视的神秘迷雾。

人是唯一有理性的存在，但理性并非人的一切。就毛泽东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更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因为他作为文革中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他的非理性对历史进程起到了一般的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长”的总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种种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在晚年的毛身上表现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情结更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推波助澜、层层加码，大大加重了文革的灾难程度。最后，不研究毛泽东非理性的一面，甚至不符合他对自己的客观评价。毛泽东自己从不违言、更自傲于他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开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2）作为二十世纪最大的独裁者之一，他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中华民族甚至是整个当代世界史上的最大的人道灾难。

凡此种种，都凸现出了一个非理性的、至今缺乏系统研究的毛泽东。

#### 一，私人情欲：在温柔乡的“塌上乱天下”

人的情欲和性欲在社会关系所允许的时候、范围和程度内，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没有人的情欲和性欲，血亲关系和婚姻关系等重要的社会关系是无法形成的。而这些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对处于社会峰顶的政治领袖的影响便常常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因、或因荒淫无道而直接导致国家衰亡、或因专宠后妃造成后宫干政，陷整个王朝于混乱中的例子都不胜枚举。前者有商纣王殷辛、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明世宗朱厚熜等，后者也有唐高宗与武则天、清咸丰皇帝和叶赫那拉氏（慈禧）等故事。甚至在文明社会里，人的情欲和性欲也常常插足到重大的政治生活中去。如果不提凯撒大帝和埃及女王的风流艳史，便不能全面地揭示罗马帝国兴盛和衰落。英国的新教改革尽管有更深远的根源，但亨利八世不断喜新厌旧的离婚案却是它的直接原因。

说起“后妃干政”，人们很可能会自然地想到文革中的江青，并认为她在文革扮演的不可一世的角色是她作为毛所宠爱的“夫人”的结果。其实，这里有很大的误解，因为江青的“干政”实际上首先是她在毛的私人情欲中失宠的结果。1949年中共建国时，江青不过35岁，尚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年龄。但是她和毛在丰泽园中已经分居两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顾了。显然，这和毛泽东的多次婚姻中一贯的有始无终、喜新厌旧的特点有关。但另一方面，江青在那时不幸得了严重的妇女病——子宫颈口糜烂，后来又被诊断为子宫癌去苏联治疗。对于性欲极为旺盛的毛泽东来说，疾病也使她自然在实质上失去了毛在性关系上对她的宠爱。但是，毛泽东碍于他伟大领袖的名声，既不想离婚，又想满足他的婚外淫欲——“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就必须要得到他的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认。当然，如同任何一桩民间法庭外了结的这类“不离婚案”一样，这种默认也必然是丈夫对他名义上的妻子的补偿为必要前提的，只不过毛对江的补偿不是在金钱上而是在政治上。根据在毛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在文革中的回忆：“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3）

根据专门研究毛泽东婚姻和私生活问题的中国大陆女学者陈小雅的考证，毛江之间的夫妻关系的战略调整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开始了：

妻子疾病的发现，对于一个“不能再娶”的丈夫来说，自然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接踵而来的问题自然是，如何调整安排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安排妻子的角色？如何过新生活？……为了适应这个调整，江青对外也大造舆论，宣称自己和毛泽东早已没有“夫妻生活”，他们的关系，只是“政治夫妻”。对此，毛泽东也不违言，予以配合。（4）

然而，江青毕竟是毛名义上的夫人，毛在外面不断升级的拈花惹草自然伤害了她原来就十分敏感的女性自尊，加剧了她对于随时可能失去的合法的“夫人”的地位的心理恐惧。为了消除这种恐惧，她又渴望通过在政治上充当毛的得力打手，不断攫取权力，来和毛保持长期利益上的一致。正是这种病态的恐惧和野心，使得江青从延安时期一个性格温顺的女子在1949年后变为一个刻薄待人、歇斯底里的怨妇，从而在文革中更成为一个疯狂报复、暴戾恣睢的政治毒妇。举江青在文革中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报复为例，就有很大的文革前她对毛的情欲导致的防卫性的猜忌。根据最近出版的王光美的回忆录，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非常喜欢请年轻漂亮的王光美一起游泳，还派秘书专车接送。据王光美回忆，有一次竟然发生了这样醋海生波的不快：

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他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5）

虽然王光美当场陪笑、平复了江青的情绪，但江青的猜忌无疑导致了她在文革中对王光美的“两个女人的战争”。虽说历史不能假设，即便是杨开慧在世或贺子珍仍然是毛的夫人，她们也完全可能在文革中充当毛的政治工具。但如果毛和江在中共建国以后的夫妻性关系和谐、江青没有因上述病态的恐惧和渴望所造成的阴暗心理和疯狂个性，文革在某些领域内所造成的人道灾难至少会有所减轻。这里毋庸违言的是：江青文革中的不可一世和她文革后的可悲下场很大程度上皆根源于她身后那位寻花问柳的风流老公的情欲。

当然，也有学者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毛、江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对文革进程的积极影响。他们认为：如果江青在文革中仍然有向毛泽东吹“枕边风”的机会，会给国家造成根大的灾害。例如，香港学者寒山碧就持这一观点：

江青虽然一直挂着“毛主席夫人”的招牌活动，但实际上毛、江已经分居。具体分居日期尚待考察，不过相信是张玉凤介入之后才分居的。一九七四年“四届人大”时候，正因为毛、江已分居，江青见不到毛泽东，无法告枕头状，才不得不推选王洪文到长沙告密；正因毛、江已分居，江青才不得不委屈请托王海容、唐闻生向毛告周、邓的状；正因毛、江已分居，毛对江的支持削弱，周、邓才可以在“四届人大”中掌握实权，抗拒江青的“抢班”。（6）

这一分析当然也是有道理的。然而，它毕竟忽略了我们前面所作的分析：如果毛江琴瑟和谐、感情和性生活正常，江青或许就不会在政治上变态。

对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预谋和发动，不少研究者常常追溯到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因为刘少奇总结了大跃进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被迫作了自我批评。这些研究者的结论常常引自毛泽东在文革中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的一段谈话：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

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7）

然而，根据中国大陆学者最近对七千人大会的详细考证，发现毛泽东其实并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经过再查阅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原始记录，结果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即使1962年4月下发的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稿，也仍然没有这段话。相反，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通篇讲话给人感觉既幽默风趣，有谦虚诚恳，洋溢着比较浓烈的民主气氛，流露出他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和谐的亲密气氛！（8）

显然，毛泽东给他和刘少奇等人的最初分歧杜撰了一个虚假的但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一杜撰还很可能完全是下意识的掩盖行为。虽然我们没有必要排斥他们之间在七千人大会上在如何纠正大跃进所造成的灾难上确有理论上的一些分歧，但是事实上还有着非理性的原因导致的冲突。换言之，毛泽东对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预谋，是他和刘邓等人一系列理性和非理性冲突的综合结果。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1961年春天震动中共上层的对毛的“窃听事件”。根据最近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署名文章，这一“窃听事件”的梗概如下：

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谈话结束，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9）

这里，中共官方的报道掩盖了最重要的史实，即这位“服务员”的性别及她和毛的关系：这位“服务员”是一位青年女性，是和毛泽东有性关系的“女友”。更重要的是，这位负责录音的工作人员录下的是她和毛在专列中发生性关系的浪声淫语。在毛的这位“女友”向毛作了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指责为“特务手段”。其实，对毛泽东的录音是中央书记处1958年12月决议，1959年开始执行的。这是当时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人为了紧跟毛泽东而采取的一个拍马屁的决定。把毛泽东外出时的谈话都录下来，就能使他们随时了解毛的政治思路，以便在他们的工作中采取主动、讨毛的欢心。没想到在阴差阳错之中录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纵，又被毛的“女友”告密——马屁派到了马脚上。引发了一场毛勃然大怒的政治风暴。

虽然事情的最后替罪羊是由具体执行这一录音计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刘少奇秘书、周恩来秘书等人承担，但是毛心里清楚得很，他们背后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对于中央一线领导人“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些党史”的解释，毛反诘道：“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可见毛完全把它看作是中国式的“水门事件”。

根据自始至终在事件现场的毛的医生李志绥回忆，这一“窃听事件”才是毛和刘等人关系敌对化的一个转折点，它对毛以后发动文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毛的私生活的放纵早已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斯大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

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是爆发出来。  
(10)

在文革准备阶段，杨尚昆便被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文革一开始，他又被打成“彭陆罗扬”反党集团成员。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里，杨被指责为：“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1)在这一反党集团中，至少有两人：杨尚昆和彭真和这一由毛的私人情欲引发的“窃听事件”有直接关联。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毛对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的仇恨极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源于他的非理性因素。

然而，毛对于自己放荡糜烂的私生活的态度是极端虚伪的。一方面，他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又要欺世盗名。为此，他对于任何一点可能的影射都会无端猜疑、恼羞成怒，引发出新的政治风暴来。顾名思义，文化大革命是在文化领域内肇始的。其中发生于1963年的“批鬼戏”的风波是文革的重要先声。但有趣的是，这场风波的发端便和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关系。1963初，经手下工作人员提议，毛为了消遣调新编昆曲历史戏《李慧娘》来中南海演出。不料该戏的内容是将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杀想争取爱情自由的宠姬李慧娘，结果李慧娘化作厉鬼向贾复了仇。无巧不成书，在毛看此戏之前，他的一个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恋爱的男青年结婚，但是毛不肯批准。她为此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被毛踹下床去，刚刚闹出了一个不小的宫闱风波。为此，毛马上下意识地认为此戏是在影射他同样是骄横淫逸的私生活：

当演出至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征逐歌舞，游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脱口而说：“美哉少年”时，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接下来演气愤异常的贾似道杀死宠妾李慧娘。我记忆中演员穿了白衫翩翩起舞的一幕，原来就是心犹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贾似道报仇的情节。当我看到毛的神态一变。毛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让他的不悦流露于外。但我学会观察他情绪的变化——锁紧眉头，眉毛高挑，身体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讳了，好像以戏剧演出来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这情节使人想起了毛不准机要员和她的爱人结婚的事，她那时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12)

果不其然，毛马上发动了对《李慧娘》和所有“鬼戏”的批判。一方面，他让江青找上海柯庆施在《文汇报》发表罕见的长达一万三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驳“有鬼无害”论〉，猛烈抨击《李慧娘》等鬼戏“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还正式发出文件指责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报告要求全国各地，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题材。”(14)就这样，一次由毛偶然看戏、毫无道理地怀疑该戏“影射”了他的私生活的小事，酿成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成为后来文革的导火索之一。还为后来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创了从“影射史学”入手进行上层政治斗争的先河。当然，该戏的编剧孟超也因此被打成向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进攻的“黑典型”，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

从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窃听事件”还使毛身边最贴身的工作人员性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五十年代的男卫士群体变为六十年代的“女友”群体。如同李志绥所说：“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十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

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15）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毛身边的年轻的性伙伴有增无减。对这些围着他“女友”，他常常怀有一种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织的心态。在他晚年和孟锦云、张玉凤等最亲密的女友谈论《红与黑》和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等作品中情欲关系时，他总是把两性关系解释为一种征服者的“阶级战争”，并把这种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权力征服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占有合理化。（16）一方面，毛的这种权力征服欲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态：古代的君王常常把被自己征服的部落和国家的后妃变为自己的女奴和嫔妃。而只有在性方面占有了她们后，才认为自己获得了彻底的胜利。而她们也才因此而成为可靠的自己人。另一方面，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理应得到众多美女的青睐和忠诚，乃至他的“女友”有一次都在背后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17）毛的这种奇怪的心态造成了他“把女人做享乐工具外，还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说她是毛的一条狗，要她咬谁就咬谁……利用性关系为政治服务，毛是史无前例的”。（18）作为他的政治工具，毛的“女友”有时也给他带来极大的利益。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要刺杀毛的阴谋，就是他的一个“女友”（谢静宜）通过她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的丈夫（苏延勋）得到消息后及时密报毛的。（19）

但是，毛的“女友”们有时也会出于自身文革中的派别利益，向毛报告一些片面的消息。而毛出于自己的膨胀的情欲需求又答应了她们的要求。其结果是反而破坏了他自己一手建立的权力制衡。1967年震动全国的“5·13事件”便是这样的例子。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武斗的双方是：1）演出派，即“老三军派”。是1966年冬至1967年春，在空军机关、海军机关、总后勤部机关和它们所属的文体单位、院校，群众组织中的所谓“保守派”。他们在空军中保吴法宪；在海军中保李作鹏，在总后中保邱会作，人数较少；2）“冲派”，即“新三军派”。他们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即所谓“造反派”，人数较多。当时的“造反”是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中央文革和周恩来支持的。军内的萧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随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大派。最初，周恩来坚决要求两派联合演出，其实是建立了军内在林彪嫡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和比较倾向于毛自己掌控的萧华、杨成武之间的权力制衡。（20）从全国的权力格局上来讲，也在以江青为代表“文革派”和林彪军人集团之间建立了必要的政治平衡。

可是，这一微妙的平衡被毛自己打破了。毛在1967年4月在他中南海的卧室见了他在空政文工团的女演员、他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刘在文工团是保吴法宪的绝对少数派，她一见了毛就哭诉“造反派在文工团夺权后，就将三人赶出宿舍……她们已经在街上转了三天。”

毛见了刘和另外两个，说：“他们不要你们，我要你们。他们说你们是保皇派，你们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个‘皇’罗。”刘从和毛的“特殊关系”中得到不少好处。毛命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叶群替刘及另两个女孩平反。叶不但照办，还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刘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在短时间内便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自此后，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有五天十天。（21）

毛泽东非但让他的“女友们”自己去找叶群，正陷于火热的情欲泥沼中毛为了讨好她们，还派了秘书徐业夫去找叶群。叶群也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大好机会用来扩张林彪等人对军委的直接控制权。林彪秘书张云生对叶群和刘淑媛等人的会面有如下的详细记载：

1967年4月的一天，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到了毛家湾。叶群接待后，把我叫了去，说：

“张秘书，我去接见空军文工团的几个演员，你跟我去做一下纪录。不然，她们几个对我一个，事后说我对她们讲了一些什么什么了，我空口无凭。”

叶群接见演员干什么？既然要见，还找个“证人”在场做什么？不待我问，叶群自己的嘴就漏了风：“徐秘书来，传‘一组’（即毛泽东）的话。空军几个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入中南海。她们在空军内部是受压的少数派，要向主席反映情况。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叶群又神秘地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小看他们，那是通天的！”

在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小招待所里，叶群接见了她们。为首的姓刘，叶群似乎认识她，至少知道她的名字。……

“叶主任，你知道，我们是保吴、余（立金）首长的，可是在空政文工团里，和我同观点的，就这几个人。”她用手指了指在座的几位。“他们骂我们是老保，还骂……”

“我们现在都不敢回去，一回去就受围攻。”另一个女演员补充说。

“你们保吴、余，并没有错。”叶群说：“我和你们同一个观点。”

“就是听说林副主席和叶主任也保吴、余，我们才保的。”小刘这时才有些笑意。

“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指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吗？”

“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小刘回答说。

“那你们就放心保吴司令，没有错。”

“文工团是演出单位，现在什么也不排练了。”小刘又说：“我们想排点节目，争取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时演出，叶主任支持吗？”

叶群说：“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搞演出，要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江青同志。江青同志使馆文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我们还要歌颂林副主席。”小刘补充说。

“还要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中央文革。”叶群越说越有劲。“你们先排好，我争取先让江青同志看看。他会支持你们的。”

“我们就这几个人，怎么排练呢？”另一个演员问。

叶群说：“你们人少，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联合演出。”

叶群的主意确实发挥了作用。小刘等人经过串连，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一些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了一些小节目。5月13日，她们在礼堂举行试验演出，由于这一演出是背着军内各单位文艺团体居于多数的对立面群众组织高的，结果遭到了这些组织的冲击。（22）

因为演出实际上是同一观点的群众组织的联合，不同于周恩来和萧华指示的不同观点的联合演出，萧华当然劝他们不要演出。但因为有毛对这些通天“女友们”的承诺，林彪公开支持演出，激发武斗。事后，林彪又利用这一事件、通过叶群幕后操纵，掀起了打倒萧华的政治风暴。根据文革研究者黑雁南的记载，对打倒萧华最致命的“最高指示”——“萧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毛泽东就是通过他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向叶群、吴法宪等人传达的。（23）

6月9日，林彪又带上他的嫡系人马和中央文革成员们再一次在人大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的演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导。此举大长了“老三军”的威风，大灭了“新三军”即的志气。从此，林彪等人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老三军派”）从中央文革手里夺过了对群众运动的指导权，就连红得发紫的聂元梓都不得不奔走于它的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成了“林副主席直接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他们马上在6月初组建了由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李作鹏的副手）组成的“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后来林彪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24）接着，他们又都在“九大”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等到毛泽东认识到一个尾大不掉的林彪军人集团已经对他的绝对权力形成威胁时，已经一定要动大手术来解决了。追溯毛泽东政治平衡格局的打破，竟然发端于他对那几个“女友”的一时讨好和情

欲纵容。对此，毛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和林彪闹翻后有所觉察：

毛的女友刘和她两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朋友，都不再允许进入中南海。刘和叶群、林彪关系密切，毛怀疑刘是林彪的特务。林立果现在空军权倾一时，毛认为她们三人都是林立果派来的。（25）——“特务”之说，显然是毛的杜撰和自辨。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毛的一丝不愿说出口的悔意。

然而，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放荡淫逸君主一样，他们都常常是要为自己的“权色交易”付出政治代价的。1974年年初由毛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本来的意图是帮助江青等毛的嫡系帮派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手里夺取更多的国务院和军委的掌控权力。为此，江青和迟群、谢静宜等人在1月24日、25日连续召开军队系统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的大会，会上江青公开点名叶剑英“开后门”送子女参军上大学的问题。之后，江青、张春桥等人又在《人民日报》和地方报刊上刊出一系列高校清查“开后门”学员的文章，比较有名的有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钟志民的《一份申请退学报告》等。（26）

七十年代初，各地的掌权者，尤其是军队干部利用特权为子女亲友“开后门”入学参军的歪风邪气已经成为全国民怨沸腾的焦点。应当公平地说，江青等人抓住这一问题向确实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的叶剑英等人开刀时，是符合党心民心的，是有着在军内扩充势力乃至在毛的支持下重新洗牌的可能的。叶剑英在1月30日向毛泽东写出了就自己的“严重错误”所作的“检讨”，但是毛却在2月15日复信中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27）毛的回答显然是不符合基本逻辑的，江青、迟群所批判的“走后门”实际指的是走后门的形式，并没有给前门后门进来的人定性。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后来成了大开后门的护身符，对全国性的党风腐败起了极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说？据毛泽东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28）显然，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说“我没有办法”而只能开后门送她们上大学，显然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约定的“权色交易”。据当年北大历史系的范达人回忆说：“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三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三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三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后来这些女孩子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29）据范回忆，这样和毛直接有关的神秘女学员，北大还有好几个。另据原中共资深新闻干部沈容在《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中回忆，毛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30）——现在事情清楚了，原来毛出于他的“权色交易”，带头开后门送了为数不少的“女友”上大学，而且不少还是通过周恩来等元老派来安排的。这样他自然没有了抓住这一机会整倒元老派的勇气，而只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与他们妥协了。两年以后，当他认识到叶剑英的威胁，采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布他“生病”、“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时，（31）已经为时太晚了。因为叶已经在军内又苦心经营了两年，形成的盘根错节早已经是资历尚浅的陈锡联所无法取代的了。

论及毛的情欲和文革的关系，不能不涉及他和他晚年的宠妾张玉凤的关系。根据李志绥的回忆，张玉凤是在1970年毛在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等人因和林彪的关系失宠以后



正式调入中南海的。但在她陪伴毛渡过他风烛残年的最后六年里，张本人在中国政治，尤其是宫闱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她从毛的生活秘书变为“机要秘书”，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险柜。里面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无疑代表着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谁都知道，这批材料对中共十分重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泽东“家人”，即实质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泽东临死前的几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锦云才能进入毛的房间，而且也只有张才听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讲话。而毛的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复的文件都要经过张玉凤之手，乃至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2）当然，由于中国宫廷秘史资料的一贯缺乏，我们对此很难下任何具体的结论。最后，在海外最近披露出来的张玉凤的回忆中，竟有这样的内容：

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33）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毛的这一荒唐昏乱的身后安排当作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临终对自己的宠妾的一种表面性的政治安慰（尤其是当着她的面所做的临终授命），因为这种安排绝无可能实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张在当时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和她含而不露的政治追求（否则她为什么不向毛当面拒绝？）。甚至，这一安排及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结果。

认清张玉凤有政治抱负对分析毛张关系对文革最后几年的影响非常重要，因为她的对毛的影响会远远超出一个“陪睡丫头”（江青对张的蔑称）的范围。在目前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可以看到，江青对张玉凤不断地“巴结”、“献殷勤”，因为毛后来根本不愿见江青。毛的房间只有两个人可以随便出入，那就是张玉凤和孟锦云。不管是谁，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亲友，无论是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34）尽管有江青放下正式的“毛夫人”身价的拉拢，张玉凤和江的关系其实并不和谐。一方面，她们之间的“大奶”和“二奶”的争宠夺利的关系极难和谐。只要张玉凤在实际上是毛的妻子，掌管着毛维持生活一切而毛对她的依赖日深，毛就不可能还想得起江青。在另一方面，张也是一个醋劲十足的泼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为怠慢了毛的一个客人而和毛互相骂“狗”，大吵一场、一时被毛赶出过中南海。这个“客人”其实是毛以前的一个文工团“女友”——陈。后来陈女士去了香港，在报刊上披露了这一内幕。（35）

但即便是从目前极为有限的已经公开披露的材料，也可以看到张玉凤（包括孟锦云）都没有在毛面前为江青美言。例如，孟锦云的回忆中就提到：毛泽东和她（及张玉凤）慎重地谈过和江青公开离婚的打算。（36）如果张一直在毛面前为江说好话，毛绝无可能、也无此必要和她们大谈离婚的打算。此外，据中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记载，张玉凤和江青自1973年年底起，多次因为张保管的毛泽东的几百万稿费发生严重冲突。为此江青甚至公开叫嚷：毛的存款“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37）如果我们联系到毛对江青在文革中最严厉的批评，即搞“四人帮”正是发生在1973年年底以后，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张玉凤在毛对江青的严厉批评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起着更重要的离间毛江关系的还有另外两个年轻女人——毛在当时的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容。因为她们两人当时认同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又和江青有私人矛盾，也就利用联络员的特权、在极为封闭孤独的毛面前讲了许多江的坏话。自然，王海容也在背后大骂张玉凤……（38）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在总结毛泽东治国方式使用了“在塌上乱天

下”的比喻。此其一是指毛泽东喜欢在床上办公的怪癖；其二就是毛在文革中“视女人为工具”，表现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纵的生命的一个环节。”（39）确实，毛泽东的晚年不仅生活在情欲横流的温柔乡里，还不时地陷入和引发他身边的女人之间的“战争”。然而，他也为情所累、为欲所害。例如，1976年5月11日，毛就又不知道因为什么无聊的糗事，和张玉凤大吵一场，结果竟导致他心肌严重梗塞。虽然抢救了过来，但大大地缩短了他的寿命。（40）毛生前虽然妻妾成群，但死时尸骨未寒，他的夫人便被投入监狱、最后自杀。对于“在塌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报应和嘲讽。

## 二，病态人格：在不间断的妄想中清除假想的敌人

多疑是一种病态人格，但任何独裁者都是或多或少地多疑的。由于他们在自己的登基之路中运用了众多的阴谋诡计，推己及人，他们自然地防范着他人效法自己来颠覆他们手中的无上的权力。然而，多疑在某些主客观情况下会发展成为一种恶性的妄想症的精神病态。例如，当独裁者力图加强自己的权力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智谋时，心胸狭隘的独裁者便会把猜忌变为妄想和行动，残忍的政治清洗便会发生。另外，人到晚年的独裁者的身体心理都会发生器质性和功能性的病变，使本来并不严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日益加剧。他们首先不断地妄想出种种不真实的“敌人”来，又运用他们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进而采用极端的手段来清除假想的“敌人”。

根据毛的医生李志绥的回忆：毛泽东的极度的疑惧 / 妄想症起源于1956年以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41）依据李的回忆，我们从如下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毛的妄想症的发展及其特点：

### 时间和地点——事件——政治形势

- 1958年初，四川金牛坝——怀疑游泳池被下毒——和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斗争
- 1965年底，江西南昌——怀疑自己发烧为下毒所至——北京彭真等人抵制批判《海瑞罢官》
- 1966年2月，武汉梅园招待所——怀疑房间天花板上藏有坏人——接见彭真等人以后，彭等人带来北京“中央”同意的《二月提纲》
- 1966年7月，回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怀疑被装了窃听装置——刚回北京，认为刘邓等人在中央仍占优势
- 1966年7月，搬到玉泉山一号楼——怀疑这里有毒——同上
- 1966年7月，从玉泉山搬到钓鱼台国宾馆——怀疑“仍不安全”——同上
- 1966年8月，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八厅——住得比较久，到最后怀疑仍不安全——和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生公开冲突
- 1966年年底，搬到中南海游泳池——没有再搬了——基本上掌握了对刘少奇斗争的胜利
- 1969年5月，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发觉服务员全部穿了军装，怀疑被他们监视，要他们全部撤走——开始和林彪发生矛盾
- 1970年9月后，北京中南海——怀疑原来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是林彪“特务”，再不允许进入中南海——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因“国家主席”问题发生冲突
- 1970年9月后，北京中南海——怀疑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大夫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同上

在精神病学中，妄想是在病理基础上产生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信念，是一种病态的判断与推理。它本身与事实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实现，但病人却坚信不移，即使经过充分的说理和有力的论证，都难于动摇他的信念，是精神病中常见的症状之一。妄想症，又称妄想型精神病，其特征是由对某真实事件的曲解，进而逐渐形成一复杂纠结的妄想系统。据临床研究显示，妄想症患者中，常见的妄想内容包括夸大妄想、被害妄想、多情妄想、疑病妄想等等。在这一症状形成的过程中，情感对思维进程有明显的影响：病人妄想内容往往与病理的情感相一致。如

情感抑郁病人往往产生被害妄想，而躁狂病人往往产生夸大妄想。从上面所列的毛泽东的恐惧妄想中可以看到：1）这是一种“被害妄想”；2）许多妄想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识，如天花板上怎么可能“藏人”（后来证明是一只野猫）？3）他在政治斗争中受挫的心态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因素影响着他的疑惧 / 妄想。

李志绥还提到了毛的疑惧 / 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础：毛长期以来的“神经衰弱”而导致的严重失眠。如他所述：“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瘙痒和阳痿，严重使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到，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毛的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么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42）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为昼的生活 / 工作习惯，使他永远在黑暗中思维，只有更多地帮助和促使了他在漫长的旷夜中的翩翩猜忌和妄想。

明白了毛泽东晚年其实已经患有妄想型精神病，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在文革中一手制造那么多常人不可理喻的冤、错、假案。论及毛的“被害妄想”，恐怕首先要提及的是他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所谓的“防止反革命政变”。文革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政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被害妄想”像一个不可摆脱的噩梦贯穿了毛的晚年，直至他的死亡。究其原因，其实是毛自己在打倒刘少奇时先调动军队搞了一场货真价实的政变。由此及彼，才时时、处处妄想着别人要对自己搞所谓的“反革命政变”。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他那个著名的“反政变”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43）关于使毛恐惧了几个月的“政变”者，这里林彪显然指的是“彭陆罗扬反党集团”。但事实很快证明：这是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是他们睡梦中都没有过的想法。但毛的妄想又造成整个中共上层的互相猜疑指责，在5月2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林彪、陈毅、周恩来等人甚至毫无根据地指责朱德要“搞政变”、“黄袍加身”。以至朱德嘲讽着反诘道：“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44）显然，这又是一出天方夜谭。

不久，毛的重要打手康生又指责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要搞“二月兵变”。有关这一荒唐的指控，1980年9月2日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里有如下的描述：

一九六六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借房子。七月上旬，北京大学有人贴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是要搞兵变。康生抓住这个捕风捉影的材料，不经任何调查，就在七月二十七日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蛊惑人心，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二月兵变”的经过，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当时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有余同志认为这是谣传，康生就指控孙“替彭真辩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立场”，要罢他的官。还有一些人为此受牵连，挨批斗。（45）

只要稍有政治头脑的人便不难明白，这种根据几张莫名其妙的大字报所作的指控完全是捕风捉影的事。问题是毛不久便相信了康生和林彪的诬陷，对贺龙从“保”到“弃”，使贺龙被隔离审查，陷入他的政治对手林彪之手，随即被迫害致死。根据不少学者的看法，使毛下决心打

倒贺龙并非只是“二月兵变”的莫须有罪名，恐怕更是贺龙和苏联军方的可能的“勾结”。〔46〕1964年11月，中共派出由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纪念活动。在11月7日的国宴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私底下向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了，现在该你们把毛泽东赶下台了。”对此，贺龙当场进行了反驳，并立刻报告了周和毛。本来，这无疑是贺龙向毛表示忠心的行为，但毛泽东却一直疑云未消，使它相反成了文革中贺龙被毛最后抛弃的重要原因。

贺龙在历史上虽不是毛的嫡系，但一直对毛忠心耿耿到了甘作“家臣”的程度。据说在延安时期，毛执意要和江青结婚遭到众人反对，时任军中要职贺龙为保驾甚至拿出他原来的土匪腔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一时颇得毛的欢心。但从毛对他的多疑寡信、刻薄少恩，最终作为假想的敌人消灭的回报来看，越是想接近毛、越是积极向毛表示忠心的人，却常常越是引发毛的疑惧/妄想，最后被当作“敌人”在他的妄想中消灭。其实，这在“被害妄想”症的临床表现上也并非少见，因为患者的疑惧/妄想常常从他最接近的、印象最深刻的人和事开始。从这一角度来窥视文革中被打倒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命运，或许会有新的理解。罗瑞卿一直是世人所皆知的毛的大忠臣。在他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对毛的安全保卫可谓鞠躬尽瘁，已经到达了一种“私人保镖”的程度。毛可能原先就准备让他在将来代替体弱多病的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但阴差阳错的是：刘少奇在1965年5月接见一个外国客人时先提到：“每个人都要准备自己的接班人，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47〕不久，刘少奇的讲话还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毛泽东看到这一文件，很可能对罗产生猜疑：一个心胸狭窄的主人是不能想象和容忍他的私人保镖被他正在策划打到的政治对手提名为国防部长人选的——在他看来，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类似“政变”之类的阴谋。更何况，1965年时候的毛已经是一个妄想型的精神病人了。

美国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总结毛泽东的文革清洗时用了“毛派抑毛，毛杀毛派”的说法。〔48〕如果说前半句还稍有一些夸大——因为毛派的中共政要在建国以来主要是“捧毛”而非“抑毛”——那么后半句实为至理名言。在中国古代君主中，亲手杀死和逼死两位自己的储君的人恐怕也屈指可数。而毛就是这样的怪人。从1966年到1971年的短短5年里，他连续杀死和逼死了刘少奇和林彪——他先后钦定的两位“接班人”。刘、林两人非但在历史上都是毛的嫡系，还都是对毛的吹捧最不遗余力者。在中共历史上，刘少奇帮助毛在延安整风中击败了他党内最强大的对手王明，又是在第一个正式和系统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人。至于林彪，毛的文革的发动完全得益于他倡导的对毛的个人迷信和他直接领导的解放军的“保驾护航”。但不可理喻的是：毛对他们的疑惧/妄想程度最深，时间也最长。以林彪为例，1966年5月18日他关于“防止反革命政变”的讲话，完全是他揣摸毛的本意，并得到毛批准后的言论。他关于毛几个月来“多少天没有睡好觉”在防止政变的陈述也都是大实话。在林彪做这一报告时，他还是毛的“亲密战友”、毛林关系更处于炽热的政治蜜月期。但仅在一个月后，毛竟然在写给他的另一位更亲密的战友江青的信中说：

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49〕

在这里，毛显然非常怀疑林彪大谈政变的动机。换言之，在毛没有明言的下意识里，隐隐

地蕴含着这样一丝深藏不露的疑惧：这位熟稔于“政变经”的朋友，是否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打算呢？……

历史的发展还真是令人惊讶，按中共的官方说法，林彪及其死党（其实是他的儿子林立果等人）在1971年真地策划了暗杀毛的政变。但综观历史，这一“政变”其实是毛的日益严重的“被害妄想症”所一步步逼出来的。1970年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毛、林公开冲突的开始。双方的争执焦点似乎是“设国家主席”问题。根据今天多位学者的调查，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毛并没有说一定“不设国家主席”，林也从没有说他要当“国家主席”。〔50〕但研究者们常常忽略了对毛泽东的妄想心理的线索追踪。在毛的《我的一点意见》里，他主要的批判对象是陈伯达。陈是毛的秘书，又是毛任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当然是毛的“家臣”。但是庐山出现局面却是：陈伯达和林彪意见一致，并为之摇旗呐喊。甚至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都一时站到了林彪一边。如同毛泽东下决心打倒罗瑞卿时一样，一个狭窄狡诈的主人最不能容忍又最容易引发他的疑惧／妄想的恐怕就是“家臣”的任何叛变行为。毛自然地怀疑到他们一起在搞“政变”。庐山会议以后，林彪便被说成是“在庐山搞了一次未遂的反革命政变”。〔51〕从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会议来看，毛的妄想症在庐山会议后的发展日益严重。李志绥讲到的毛把周恩来派来的三个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医生胡说成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特务便是明证。接着，毛对于林彪要搞“政变”的妄想似乎越来越固执，他采取了一系列先发制人的极端做法。例如，他作为一个党的主席，公开破坏党的纪律，在他1971年8—9月的南巡中到处拉拢地方军政大员、攻击党的副主席林彪，并积极准备再发动一场打倒刘少奇这样的宫廷政变。如同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和他的朋友们在《571工程纪要》中所说：毛“是一个怀疑狂、虐（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52〕说来真是弄巧成拙，年轻气盛的林立果等人的政变想法就是这样被毛的政变“妄想症”逼出来的铤而走险。

毛泽东晚年的病态人格在多疑上常常走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例如，他和彭德怀在庐山上的冲突甚至和彭的乳名“彭得华”密切相关。据警卫员回忆：毛在决定整倒彭德怀的哪一夜“吃三次安眠药仍然没睡觉”，他还对自己身边的卫士田云玉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53〕再如，1971年林彪事件时，毛泽东曾向人打听说：“李医生（李志绥）的儿子取名李重，重是千里，志在千里，李志绥是不是有野心？”〔54〕

（未完待续）

~~~~~

## 【抗拒遗忘】

### 压制的记忆与待写的历史

• 白 夏 •

在本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国舆论看中国”专题节目时间里，我们给大家介绍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白夏教授的一篇有关中国集体记忆的文章，此文刊发于法国汉学杂志《神州展望》2007年第四期，题目为《压制的记忆与待写的历史》。

该刊在文章提要中写道：此文是一篇探讨中国政治权力掌控历史及官方如何向社会灌输历史的研究著述，中国的一些基本历史事实如57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等均长期被禁止讨论。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现代历史的传输虽然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历史上的黑洞却仍然存

在，尤其是1989年的天安门惨剧仍是最大的禁区。这种对历史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民主运动的记忆无法形成。

作者在文章开始时简要提到了中国官方修史的传统。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之后，为了建立自己王朝的合法性，重修前朝的历史就是一项重要措施。白夏认为，虽然这一传统到1911年就不再延续，但是，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将政权奠立于历史之上是十分重要的。

1949年之后的中国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自十月革命开创共产主义时代以来，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均对历史实行操控。长期以来，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曾经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不同时间领导人合影的照片，了解谁被从照片上删去了。作者表示，中国共产党政权既继承了中国文化官方修史的传统，又承继了苏联重新编织历史的手法。

对于一个共产党国家来说，由于没有选举，于是通过历史寻求政治合法性就变得极端重要。作者表示，中国目前的各种节日庆典，如七一是党的生日，八一是解放军建军节，十一是国庆节等等都是以党的历史来规范国家和社会的生活节奏。每当节日到来，各种纪念活动、老革命的回忆等等均是塑造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

白夏同时指出，自然这种以统治者挑选的历史事件为历史定调的做法并非只限于共产国家，其他的专制国家也同样会利用历史为自己营造政治合法性。但是，作者认为，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则是，中国只有官定的历史，如果说民间不是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的话，至少空间是极为狭窄的。

白夏教授以当年苏联的一则政治笑话来说明这种编造历史的荒谬性。据说，当时有人打电话到苏联加盟共和国亚美尼亚电台询问：是否可以预见将来？电台的回答是，绝对可以，这完全不是个问题。我们清楚地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的问题是预见过去，我们的过去在不停地变化。

白夏教授指出，中国各个时期的领导人出了问题之后就消失于中国官方的历史书籍，刘少奇、林彪是很好的例子。这一现象说明在中国领导人那里，历史的意义十分重要。但是，仅仅是定期修改历史教科书对于政治合法性来说仍然是不够的，对历史的任意修改还必须助以对记忆的控制。

在毛泽东的时代，对记忆进行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法是进行“阶级教育”。将学生送到工厂或农村接受阶级教育，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吃忆苦饭，请老农民、老工人讲过去阶级敌人如何压迫、剥削穷人，如何狠心要求工人农民长时间的干活，使他们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在这种阶级故事中，除了有穷人受剥削的内容之外，更重要的还有“有压迫就有反抗”的内容。农民、工人当然会奋起反抗，但是终归势单力薄而不得不以失败告终。直到有一天，来了红军、来了共产党，于是云开雾散，红军解放了村子，将被剥削的农民从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解救了出来。

不过，作者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的历史记忆还不完全停止于此。革命之后，官方的历史不仅批判旧社会的阶级敌人，也要批判新社会的被揭发出来的阶级敌人，他们在不同时期是右倾份子、右派、修正主义份子、走资派等等。共产党发动极为密集的各种政治运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教育来不断地重塑青年人的记忆。这种政治教育一方面十分重视仪式的举行，政治学习、忆苦思甜教育，英雄人物宣讲活动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共产党不仅调动阶级意识，也调动人性情感世界，用各种个人的经历和故事来塑造年轻人的心理。

不过，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对集体记忆的塑造也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手法，而且这种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记忆也会遇到反抗。也就是说虽然官方记忆无处不在，但民间记忆也没有完全泯灭。

白夏指出，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记忆差不多就意味着遗忘，家庭成员之间也不能传达同党的指示不一致的记忆。当年运动有所谓“划清界线”的说法，在家庭内部，子女与父母之间，夫妻之间，都不能讲述自己与党的指示不同的亲身经历。众多的右派子女完全不知道其父母有何种言论，他们只是认定其父母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

文革时期，众多的红卫兵和知青忠实地听从党的宣传，相信右派绝对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份子。只是在大串联和上山下乡时，一些红卫兵和知青才开始了解到原来右派并非如此反动。作者引述现在的异议人士魏京生的思想转变过程说明这一观点。魏京生是高干子弟，文革初在新疆串联时遇到了一个女右派，女右派给魏京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使得魏京生开始怀疑他一直深信不疑的共产党的宣传。对过去的隔膜使得众多的年轻人无法独立思考问题，而对过去的重新认识则促进了他们的觉醒。

不少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有机会互相交换各自不同的经历和见闻，其中部分人也有机会读到一些被禁的书籍。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的集体记忆长期只有官方规定的一家记忆，只是到了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之后，中国的部分历史才得以重新出土，集体记忆被掀开了一角。白夏教授指出，苏联赫鲁晓夫上台时期，苏联也出现短暂的解冻，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是此时被赫鲁晓夫批准出版的。社会变革需要从历史中寻求合法性，这不是共产党政权改革的专利。南美专制国家智利、阿根廷的民主变革时期也同样伴随着对历史记忆的重新解读。随着民间大量的回忆、传记等书籍的出版，官方对历史记忆的垄断被打破。

但是，文革后中国的民间记忆的复活并没有突破官方的界线，官方封锁对反右运动、文革等的讨论。作者表示，1978年中国出现了民主墙，这是著名的第一次《北京之春》运动。然而，1978年在民主墙发表自由和民主言论的青年人同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年轻人一样，均对他们的前辈的言论和观点一无所知。换句话说，中国争取民主的运动被取消了历史传承，每一代人都要从零开始。他们不知道其父辈曾经也有过争取民主的努力，也曾经朝民主和自由的方向上作过探索。这使他们无法接收历史的遗产，既不能从组织上吸取教训，也不能站在更高的思想高度。

为此。白夏举出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记忆运动为例说明历史记忆对于政治合法性的极端重要性。中国何时能够出现一个类似的运动呢？1987年，中国著名作家巴金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但不被官方允许。1989年六四惨案过去十几年了，中国却见不到有关此事件的片言只语。

白夏提问：中国目前官方虽然仍然封存记忆，但是官方已经不可能禁止民间私人场合的记忆。但是，这种记忆能否战胜官方的记忆垄断呢？中国的政治反对派的形成和成熟是否有赖于中国历史记忆运动的出现呢？

白夏教授表示，十多年来。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做一些抢救民间记忆的工作。如丁东所主持出版的《老照片》杂志，通过对民间的个人记忆的叙述，发掘被遮掩的个人与家庭的历史，同时也观照大的历史时代。一些当年参加过文革的知识分子如徐友渔也发表自传，讲述当年的历史。白夏也举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在整理个人回忆与资料上所作的努力，如他从旧书摊上发现

的杜高档案，后来整理成书，以《又见昨天》为题出版，系统地再现了当年共产党的干部如何收集材料，如何从个人私人谈话中寻找定罪证据的过程。

作者最后指出，这一民间的抢救记忆的行动也许还会发展下去。中国的记忆运动也许不会像当年苏联那样有组织、有系统，但中国的记忆发掘在没有政治改革者的推动下已经出现，这也许便是中国之特色。

□ 原载《神州展望》2007年第四期

~~~~~

## 【往事追忆】

### 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批清运动”

• 戴维堤 •

（编者注：本文摘自《逝者如斯》一书中有关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1970年的中国，红卫兵学生们早已被赶下了文革历史的舞台，但文革并未停止。我所在的738厂又派来了新的军管会，奉上级指示，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批清运动”。

关于批清运动，历时数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大张旗鼓地搞了数年，被整的干部群众何止成千上万。光一个小小的738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据资料载，江苏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抓出了27万、一个六千人的工厂就抓出了二千多个“5·16”分子。许多地方和单位抓“5·16”中关“牛棚”的人数近乎天文数字，施行的刑讯逼供手段令人发指。据有人粗略估算，“批清运动”中，全国起码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被关押、致死、致残、“发配充军”、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这么大一个运动，整了这么多人，最后不了了之。如果说文革中最大的冤假错案，这绝对是其中之一。可是，某些党史、文革史“权威”和“御用文人”们至今对此事连“屁”也没有放一个，甚至有人至今认为抓“5·16”整的是“造反派”，好得很。据说只有和抓“5·16”毫无关系的伟大的邓小平说过，抓“5·16”是错误的，应当平反。

多少年来，在抓“5·16”运动中被伤害的干部群众忍气吞声，忍辱负重，没有说三道四，更没有闹事。为了国家的大局，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他们忍了，他们认了。他们没有搞报复，没有把整过他们的人置于死地，更没有挖他们的祖坟。中国人多好呀！这些可敬的我的同类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向他们三鞠躬。

或许我没有同类们那么大的气量。不，这不是气量大小的问题，也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血写的历史。不是要“全盘否定和控诉文革”吗？笔者也来助助阵。为了披露历史真相，揭露丑恶，吸取历史教训，教育子孙万代记住黑暗年代里的黑暗故事，我有义务重温历史，来讲讲抓“5·16”的故事。

蒯大富在挨整时，曾发牢骚哀叹：红卫兵是一年香，二年臭。我追加两句是：三年就挨斗，四年、五年成了“5·16”。

“批清”运动一开始，就来势凶猛。伟大领袖又发了最高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



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5·16’。”林彪老贼不甘示弱，杀气腾腾地跳了出来，象疯狗一样狂吠：“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5·16’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锦上添花，火上加油：“查‘5·16’，不但查组织，也要查罪行，罪行够了，就是‘5·16’。”

看来，“5·16”这个宝贝儿确实存在，不但存在，还很了不起，惹得领袖们如临大敌，草木皆兵。

30多年过去了，人们要问：“5·16”啊“5·16”，你这个宝贝在哪里？

30多年来，对莫须有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没有人站出来说个清楚。那些制造了“5·16”大骗局的政客们上欺领袖，下压庶民。然而，在他们（当然是林彪、四人帮之流）受审的时候，竟然没有一条“利用抓‘5·16’运动迫害干部群众”的罪名。（注：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那个所谓的“历史的审判”是多么“偷工减料”、派性十足。）那么，只能解释，抓“5·16”运动好得很，不是问题。那么请问苍天：错误地整了上千万人，牵连了家属、亲友数亿人的大运动谁来负责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赞同”国外某些法西斯恐怖组织的做法，他们干了坏事之后，立即声称对该事件负责，省得人们疑神疑鬼。这大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可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注：这种说法很时髦，也很保险。）连恐怖分子都不如。

对于“5·16”这只冷冻了30多年的“螃蟹”，既然某些人怕吃坏肚子至今不想动筷子，那笔者就不客气了。现在，且听听笔者一家之言。

笔者认为，1967年武汉“7·20”事件之后，在手握军权的林彪和“中央文革”之流的煽动下，全国到处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毛泽东看事不好，怒斥“毁我长城”。（注：有文革研究者认为有“还我军权”之意，另论。）中央文革看事不好，急忙把王力等人抛出来当了“替罪羊”。但军界的老师傅们和各大军区的将军们不买帐，继续指责中央文革，并对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怨声载道。这时（1967年春、夏季），正巧有一些极左思潮严重的学生（北京钢铁学院张建奇和外语学院刘令楷等人）以“5·16兵团”的名义贴出了给周总理提意见的大字报，刮起了一股反总理的“妖风”。这些人数不多能量很大的家伙们很快被谢富治抓了起来，周总理知道后让他们放了。这件事很快就平息了。

这就是说，“5·16兵团”确实存在，但仅局限于北京几所大专院校的几十至上百人，大部分被抓过，且事情早已平息。

面对当时全国纷乱的局势，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十分着急。武汉“7·20”事件军队“造反”和有人反周总理这两件事对毛泽东震动很大。（注：有人说这时周恩来同毛泽东多次密谈，并以辞职向毛泽东施加压力，要毛泽东抓‘5·16’云云。笔者没有证据，不敢妄谈。）没有军队的支持，没有周恩来的支撑，共和国的大厦将倾覆，文化大革命将以失败告终。毛泽东权衡利弊，考虑再三，认为保住枪杆子、保住周恩来是头等大事，其他都是次要的，于是决定“安抚”周总理和军界（用军管会抓反总理的“5·16”就是铁证）。这样必须忍痛割爱，继续“丢卒保车”。“卒”者，“王、关、戚”和红卫兵、造反派也！“车”者，中央文革也！中央文革的政客们也认为，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利用价值已不大了，何不把自己干的许多坏事都推到他们身上，以平息一下“老家伙”们的怨气，取得“老家伙”们的谅解，保住自己已经到手的权力和地位呢？但这样干，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借口，而反周总理的“5·16”兵团正是一个好“宝贝”，尽管事情很简单且早已经平息了，但中央文革的政客们仿佛拣到了救命

的“稻草”。于是，他们无中生有，小题大做，把只有几十个人且早已被抓起来了的“5·16”兵团“招兵买马”，“增员扩军”，然后煞有介事地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谎报军情，把“5·16”兵团说成是以萧华、“杨、余、傅”和“王、关、戚”为后台的（后来又加上陈伯达）、遍布全国的、文武结合的、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政客们知道毛泽东一辈子最讨厌别人搞阴谋），如不清查和打击，十分危险。可悲的是，领袖们和中央文革的政客们“英雄所见略同”。于是，上演并制造了文革史甚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惨剧和冤狱。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当年希特勒为了致德国共产党于死地，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对共产党栽赃陷害并大开杀戒。“中央文革”经过一番秘谋，由姚文员出面，先造舆论，抛出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批清”运动从天而降，全国范围全面开花。结果是，几乎一夜之间，全国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为毛泽东充当了一年多“炮灰”且倍受其宠爱的“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们一下子变成了“过街老鼠”，成了“罪大恶极”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

伟大、英明领袖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万万没有料到，这场抓“5·16”运动的结果丢的不仅仅是“卒子”，连“马、炮、士、象”也丢了，“四人帮”这些“车”们最后也没有保住。丢了“车、马、炮、士、象”，文革这盘棋还下个屁？光杆司令纵有天大本事，也无回天之力。想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大势已去，众叛亲离，成了光杆司令，面对四面楚歌，只好挥泪别姬。伟大、英明领袖毛泽东一生运筹帷幄，百战百胜，“笑傲江湖”，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蒋介石之辈为“小把戏”，然而晚年却“败走麦城”，“挥泪别姬”，何故也？盖因“文革”这盘棋走错了“步”也！而单从战术来说，由于人老了犯糊涂，抓“5·16”一步棋走错，步步皆错：如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批“周公”，三落三起邓小平，最后导致全军覆没，不能不说是势在必然也！看来毛泽东的确是人不是神。

有文革研究学者戏言，光看晚年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很难相信他就是那个打败了国民党80万军队的英明统帅。其文革战略战术很难恭维，逻辑思维充满了矛盾和混乱，偏听偏信，优柔寡断，朝秦暮楚，出尔反尔，有许多重大失误和失策。在对待刘少奇（不该那样整，更不该整死）、林彪（不该逼上梁山）、周恩来（活活累死）、邓小平（要么早重用，要么不用）、王洪文（花花公子兼小丑）、华国锋（草包一个）和红卫兵造反派（斩尽杀绝，自毁“长城”）等重大问题上，他犯了“老年痴呆症”。

以上所述，虽是一家之言，但恐怕不无道理。读者若另有高见，笔者洗耳恭听。

~~~~~

## 【难忘岁月】

“秋后算账”：组织结论和处理

• 梁守福 •

（编者注：本文摘自《乱流浮沉半生缘》一书中第十二章：“凿穿底的小船”，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九七九年八月下旬，省委常委刘廉民、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史钧杰、省直党委书记陈云亭、省工交办主任卢荣景、省电子局党组书记腾野翔，还有两位女同志作记录。在省委北楼某个会议室共同找我谈话，真可谓“四堂会审”。

刘廉民主持会议。他开始说，今天请梁守福同志来，是传达省委八月二十三日晚的有关会议精神。省委常委认为：“经审查，梁守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组织上和“四人帮”没有任何联系；同宋佩章、郭宏杰、吴从树、李定山，也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没有参与指挥任何武斗事件。但你作为主要头头，应负领导责任。梁守福同志的问题，是积极执行了“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执行也是错误，甚至是严重错误。因此，省委决定你到淮南劳动一个时期。要带临时组织关系，好好过组织生活。我已同淮南市组织部联系过了，他们把你安排在淮南化肥厂仪表车间。他们很欢迎你到淮南去，并已同淮南化肥厂联系过了。梁守福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我说：“我服从省委决议。但有两点要求：第一点，我是不是可以继续留在省无线电厂劳动？因为去年我已在厂里劳动一段时间。如果到淮南去劳动，家里有一定困难，上有老，下有小。第二点，我希望省委给我做个正式结论。免得以后再来运动，老翻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旧账。”

刘廉民先回答我的第二个要求。刘说：“要不要做结论，看你到淮南劳动锻炼的情况。劳动锻炼得好，也可以不作结论。”对我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刘说：“我把你的要求向省委常委反映。”接着又改口说：“对梁守福同志提出继续在合肥劳动锻炼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就在这里讨论一下？”会议沉默一会，陈云亭发言说：“梁守福在合肥熟人太多，影响又大，干扰也大。到淮南去对他劳动锻炼有好处。”会上没有人对陈云亭的意见发表看法，等于默认了。

这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史钧杰发言了。他说：“我原来不在安徽工作，来安徽后，不少老同志向我谈到过你。认为你年纪轻，身体好，有能力，又懂业务。你相信党还是会用你的。你先到淮南劳动一段时间，结论的问题，刘廉民同志已经说过了，可做可不做。看你锻炼的情况再说。”

根据当时的情况，我要求在合肥劳动锻炼是行不通。最后表态说：“我服从省委决定，到淮南劳动锻炼，但我不想到淮南化肥厂，我不是学化工的，对化肥不懂。我是学无线电技术的，最好到无线电厂劳动锻炼。这样可以发挥我一技之长，给党多做点贡献。”这次刘廉民再一次做我的工作，他说：“淮南化肥厂条件好，宿舍、生活、工作，都给你安排好了，厂党委还为你专门开了会。你的工作，安排在仪表车间，不给你安排夜班”。但我坚持到无线电厂去，最后，省委同意我的要求，到淮南无线电三厂劳动锻炼。

.....

一九八〇年，万里调离安徽后，省委第一书记像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我被压在“五行山”下，无人管、无人问。别人可以不关心我的死活，但自己不能不关心。我让妻子先去找王郁昭，王郁昭让我写一份报告直接送给他。我写好报告，在妻子陪同下，直接到王郁昭家。王听说我的结论至今未做，感到很吃惊。王说：“郭宏杰的结论都做过了，你怎么还没做？我将你的报告同黄璜同志（时任省委书记）商量一下，尽快给你解决。”

就在我给省委写报告不久，我的专案组副组长张某某到我家，告诉我专案审查已经结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错误。我们调查到哪里，哪里都为你说好话。在写你的结论时，虽然也有争论，但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情是由你个人负责的，因此结论材料和结论都比较

简短。给你的结论是这样几句话：“经审查，梁守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错误，属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免于处分，建议省委组织部分配一般工作。”张又说：“这个结论拿给孟书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孟家芹）审批时，孟说，‘分配一般工作要改掉，应写成建议省委组织部分配适当工作。我们是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对人的处理，应视犯错误的事实而定，不能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定。对人的处理意见一定要与错误事实相符。我们不是对一时的政策负责，而是要对历史负责’。专案组根据孟家芹的指示原则，将结论改为：经审查梁守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错误属一般思想认识问题，免于处分。建议省委组织部分配适当工作。孟书记对这个结论立即签了字。并以省纪委的名义上报省委常委。”

我和王郁昭谈话后几天，去找黄璜。黄璜很客气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你给王省长和我的信，郁昭同志给我了。我们已商量过，很快给你解决。省纪委的审查结论报告常委们也传阅了，我想利用开常委会议时，穿插把你的问题解决掉，不要单独开常委会讨论你的问题。并问我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求回工大或别的什么学校教书。学校如果不能去，到一般研究机构整理资料也行”。

一九八三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二中全会，会上陈云提出全国清查不彻底问题，他的两句话，比小人物讲一万句还顶用。于是，在全国又掀起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一次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次是逆向地整党内、党外的造反派，我当然是首当其冲，在劫难逃。于是，安徽省在中央工作组的指导下，对我做出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理决定。这个内容在《安徽日报》刊登之前，省委还派人找我核对名字，我到底是叫梁守福还是叫梁守富。他们搞不清，我只是简单地回答一句：“我档案里的名字是哪个，你们看一下不就清楚了吗？”他们说：“再调档案查来不及了，明天就要见报”。我说：“既然你们如此仓促，连我的档案都没看过就给我下结论，我看你们也是奉命办事，我就告诉你们，我的名字叫梁守福，是幸福的福，不是富贵的富。”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读者，前面我说过，我的组织关系和工资关系都已转到淮南，我是淮南市的一名普通党员和普通职工。结果对我的组织处理决定是由省电子工业局党组做出的，与当时党章的要求是否符合？

另外，我当时还是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未换届，又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就罢了。

一九八四年的元月二十一日，我和三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起上了《安徽日报》的头版头条，我被开除党籍的规格上升了，与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们平起平坐。

后来，听说胡耀邦对安徽处理这件事情的做法十分生气，并指示以后类似的问题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得擅自见报。也就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一个省市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对某些人说是十年，而对我来说，整整进行了十八年。我想用一首诗总结我的前半生，也是结束本书。

万紫千红一镜中，阴晴圆缺树轮重。  
昨日童颜向春貌，今朝华发对秋风。  
画图不识众神面，讴歌难吐满腔情。  
耄耋应归南山下，煮海种豆类逝翁。

我现在虽未到耄耋之年，但已住在合肥市大蜀山下的“梦园”里，把“梦圆”倒过来就是

圆梦。写此书就算圆我这个还活着说话人的梦吧！因为活人总得做梦。此书也是为纪念“八·二七”事件发生四十周年而作。

~~~~~

## 【读者来信】

### 评王广宇的“桀骜不驯的蒯大富”

· 李自茂 ·

自称为“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的王广宇在《记忆》第十一期发文，回忆了他与蒯大富的交往。（见本刊 zk0902c）

笔者并不看重他对蒯的印象与看法，看重的是他的“工作人员”的身份。王先生在文革期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读者由他在文内的字里行间便可见一斑。文革中，中央文革已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王广宇作为办事组的成员乃至组长，那地位比中央委员还高（可谓见官高半级）。以他的“出身”，写出“回忆”，一时势必“洛阳纸贵”。

载于“记忆”的文章，自当属“史实”类，日后将被收入“史记”。但笔者看后如堕五里雾中，不辨东西。清华大学那段历史被王先生搅得面目全非。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试撮其要者，述评如下。

（一）“于是中央文革小组决定解救蒯大富，宣布蒯大富不是‘反革命’。中央文革的支持使蒯大富的名声鹊起，一夜之间从‘反革命’变成响当当的‘造反派’。于是蒯大富趁势拉起队伍，成立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任兵团司令。不久又成为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

披露出的这段话中，蒯之“三司司令”一职，在文中已被他人解除，此不赘述。

当年在清华的人清楚的记得，1966年8月5日和8月22日，周恩来两次携中央文革及一干领导到清华开万人大会，批评工作组，为蒯大富等“蒯派”人物平反。王说是“中央文革决定”云云，与我的记忆就有了偏差。若王辨解说那时周恩来等同中央文革，倒也没大错。问题是蒯大富并未因此而“名声鹊起”，更未“一夜之间”就“变成响当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蒯大富、王铁成等在清华的状态是：“不是反革命，至少也不是好人”。这个事实在许多清华人的回忆中都可找到，如万润南的“遗事”内。蒯大富也未“趁势”就“拉起了队伍”，而是由8月5日算起的50天后，即9月24日才在两个山头之外“拉起”井冈山红卫兵。至于“兵团”一说，更要迟至12月底。

这些在清华文革大事记里明白无误标明了的事实，王先生竟信笔涂鸦，我不明白是他“失察”还是其它？他的井冈山有“勤务员”一说，更令我等不明就里，以为他在谈北航，因为清华井冈山向无勤务员一说，而只有总部委员。

（二）“我第一次见到蒯大富，大约是1966年8月，一个晚上，在中南海西门的一个接待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几个人接见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头头，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内容我回忆不起了。仿佛是议论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方向和领导层的团结问题，我参加了这个会并作记录。”

与前一段相似，王先生按“一夜之间”、“趁势拉起”的笔法，在66年8月就见到了四个

月后的“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头头”，不但开了小会，（请读者注意，是小会，就是说坐得很亲近，不会搞错的！）王不但参加，还“作记录”。我相信王先生的“记录”还在，请他拿出晒晒，并把它送交历史（党史）博物馆，以飨后人。

（三）“蒯大富这时翅膀已经硬了，他的权势不仅在京城而且伸向全国，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在全国各地横行，各地发生的打砸抢抄抓事件几乎都有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影子。”

笔者固陋，文革中仅出校们两趟，除66年10月在东北转了几个大城市外，就是在67年夏跑到绵阳军分区“拥军”了，确未看见井冈山兵团如何“在全国各地横行”的姿态。但，王先生说，“各地发生的打砸抢抄抓事件几乎都有清华大学井冈山的影子”，就属臆断了。

我要求王先生必须就此话提出确凿的证据，并把那证据放到《记忆》内，否则就写出道歉文字来。绝不可继续文革大字报的笔法，信马由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打击一大片”而保护中央文革“一小撮”。

有中学文化水准的人就能看明白，“几乎”的数学比例当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则是无例外。我请问王先生，你在全国知名的武斗事件，如石河子、上海打上柴联司、重庆、青海、广西、武汉7·20等事件中看到的“影子”之本主是哪个？就是在清华园内，抛开“百日武斗”，其它“打砸抢抄抓”事件中又有哪些井冈山的影子？凭空臆断是不行的。

王先生身为中央文革的重要成员，理应指出在那些事件中中央文革的“影子”，也真实的把自己“影子”在哪里告诉我们和后人，而不要去“望风捕影”。

（四）“这里我不是来辨别王力在天安门城楼讲话的真假，而是通过这件事来看蒯大富对待当时正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态度。他对王力的批评居然置之不理。可见此蒯司令何等牛气！”

窃以为王先生这里的认识有偏差，对回忆史实来说，蒯司令何等牛气并不重要，辨别王力讲话的真假更重要、也更有意义。我相信王先生当年乃至今日都有此能力。说到牛气或牛B，应当说王先生比蒯更牛B，唯其如此，王才对蒯的牛B耿耿于怀，四十年不忘。

凭心而论，王先生的回忆也有枝有叶，不像有些回忆录全部胡编乱造，或乔装打扮，或文过饰非，或瞒天过海，或东拼西凑。我之评述王的文章，仅因王先生的名气大，我更看重而已。王先生的文章还是由海外传回来的，可见其影响之广。

期待王先生写出令我们这一代满意的不掺情感的真实的回忆文字来，那对研究文革、对后人、对中国，都功莫大焉。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